

A Collection of

考古学专刊

Xia Nai's works

甲种第二十六号

夏鼐文集

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

下 册 目 录

第五编 中外关系史的考古研究及外国考古研究

外国字铭文的汉代(?)铜饼	3
西安汉城故址出土一批带铭文的铅饼	10
“和闐马钱”考	12
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18
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32
新疆吐鲁番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39
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朝银币	46
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51
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萨珊银盘考	71
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	75
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	82
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的拜占庭式金币	92
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	94
中世纪中国和拜占庭的关系	99
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	102
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	108
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	112
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	117
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	127
瑞典所藏的中国外销瓷	133
中国、瑞典友好关系的历史	139
中国、巴基斯坦友谊的历史	145
一个古埃及短语在汉语中的对应例子	154
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	155
古代埃及珠子的考古价值	166

2 夏鼐文集

若干埃及出土的玻璃分层眼状纹珠	172
几颗埃及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	178
柬埔寨著名的历史遗产——吴哥古迹	180
秘鲁古代文化	188
阿尔巴尼亚考古旅行记	196
马其顿皇陵宝物重现人间——希腊访古记	211

第六编 历史学论著及其他文字

秦代官制考	219
魏文侯一朝之政治与学术	233
二程的人生哲学——读《宋元学案》札记之一	250
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	255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	278
百年前的一幕中英冲突——拿皮耳争对等权的失败	285
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	294
评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	337
评武培干著《鸦片战争史》	344
评陈博文著《中日外交史》	357
评萧一山著《清代通史》	364
洋书辨伪	382
吕思勉《饮食进化之序》的商榷	395
《风俗通义》小考	398
《〈真腊风土记〉校注》序言及版本考	400
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	412
《冯家昇论著辑粹》跋	420
夏鼐先生学术活动年表	423
编后记	434
英文目录	435

第五编

研究及外国考古研究
中外关系史的考古

外国字铭文的汉代(?)铜饼*

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4件大同小异的小铜饼，都是一面凸起，带有龙(?)纹的浮雕，另一方面凹下，围绕一圈外国文的铭文。这4件的登记号、来源、大小和重量，现在列举如下(各件厚度，因为凹凸不平，只能测定近边缘处约厚0.5厘米，中央部分稍厚)：

(1) 52·5·1028(入馆时原号38.2.3413)(5-1, 2)，1949年霍明志捐赠，据云在甘肃河州购得。径5.41厘米，重104克。

(2) 56·罗·117，1956年罗伯昭捐赠，据云长沙出土。径5.37厘米，重112克。

(3) 60·周·541之1，1960年周德蕴捐赠。径5.5~5.65厘米，重117克(图5-1, 1)。

(4) 同上之2，径5.4~5.5厘米，重109克。

这4件中，仅霍明志旧藏的一件(5-1, 3)，曾在他所著的《达古斋古证录》中发表过^①。

据我们所知道的，同样的小铜饼此外还有三四件：

(5) 郑文焯(叔问)旧藏的一件(5-1, 3)，曾有拓本发表于《神州大观》第二号中^②。这件的铭文和上述4件，稍有差异。

(6) 蔡季襄旧藏的二件，据云：系铜铅两种，乃一范铸成。“铜者黑锈斑烂，得自旧京；铅者鍍金。安徽寿州出土”^③。蔡季襄文中插有原物照片一幅，未注明系二件中的哪一件。细察照片中铭文，有一大段漫漶不清，显然不是前5者中之一。残留的铭文和上述(1)~(4)号相同。

(7) 加拿大的多伦多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是怀履光(C.W.White)在开封时所购得的，传闻洛阳出土。据云铭文和上述第(1)号的相同^④。

* 本文原载《考古》1961年第5期，署名“作铭”。

① 霍明志：《达古斋古证录》，1935，第10页(附有图片)，北京。

② 标题为“腊丁金槃文”，见《神州大观》第2号，即《神州国光集》第23集，1913，上海。

③ 蔡季襄：《汉西域大秦国马(原作裹，为排印方便，本文中改作马，音异义同)蹄金考》，《泉币》第19期，1943，上海。

④ 密兴黑尔芬(O.Maenchen-Helfen)：《一件中国铜器上安息钱铭文》，《大亚细亚》(Asia Major)新号第3卷第1期，1952，第1页，伦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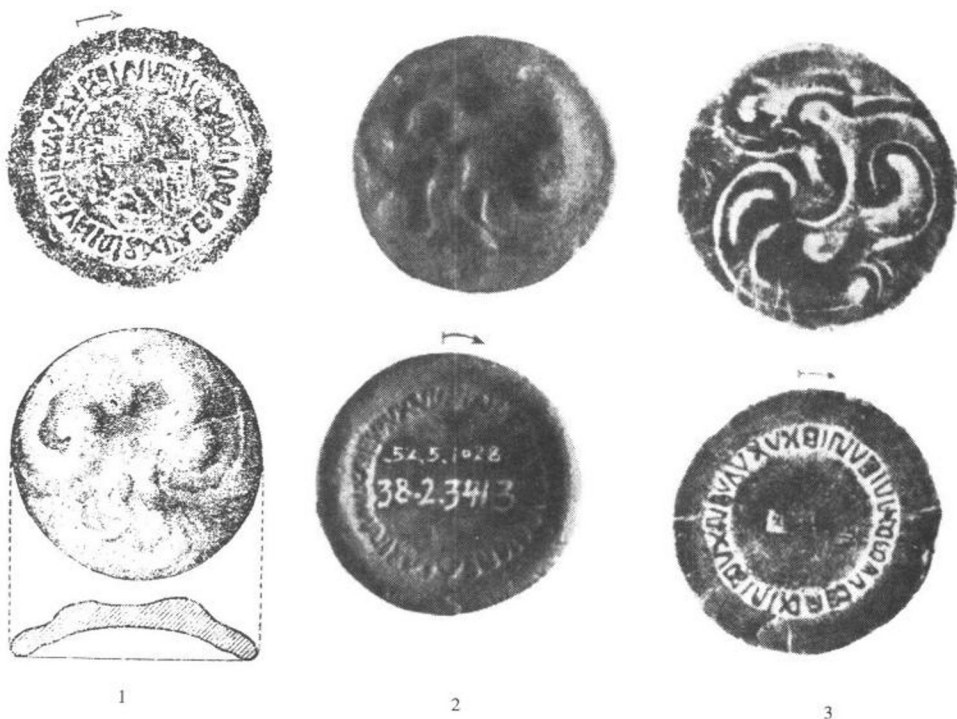


图 5-1 外国字铭文的铜饼

1. 历史博物馆 60. 周 .541 之 1 2. 历史博物馆 52.5.1028 (正面, 背面)
3. 郑文焯原藏 (拓片, 正面, 背面)

此外, 伯希和 (P. Pelliot) 曾提到在 1928 年末北京大学钢和泰 (Staël-Holstein) 曾寄给他一张照片, 他觉得铭文的字母有点希腊文的气味, 但是他也考释不出来^①。这件大概便是上面第 (1) 号霍明志所旧藏的那一件, 迈尔夫人 (Mrs. W. Mayer) 于 30 年代初在北京购得一件, 形制、大小、铭文, 都和上述第 (5) 件完全相同, 可以肯定地说纵使不是郑氏旧藏的一件, 也一定是那一件的翻制品。这件直径 4 厘米, 厚 0.5~0.8 厘米^②。

解放以来, 我们发掘所得的大量资料中, 据我所知道的, 似乎没有发现过同样形制、同样铭文的这种铜饼。这自然引起了原物真伪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 上面所罗列的 7~8 件, 有些一定是仿制的伪品。它们形制简单, 翻制很容易, 而奇特稀见, 又容易在古董市场上脱售。尤其是蔡季襄所得的铅质鍍金的一件, 更是靠不住。但是据《神州大观》上所发表的郑文焯 (1856~1918) 拓本题跋, 这

① 《通报》(T'oung Pao), 1932, 第 194 页, 莱顿。

② 密兴黑尔芬, 前引文, 第 1 页。

件藏在他家中近百年。1896年他在上海送于式枚随李鸿章出使海外的赠诗中，便曾提到这一件“腊丁金槃”。这似乎表明至少有一两件确是古物，尤其是郑文焯原藏的那一件。

其次是铭文考释问题。郑文焯在拓本跋语中说：“曾携之沪上……法之教士号能识西域古文，以此示之，亦不可识。俄国诏国中博士考定，亦无能悬解者。老友宋芸子使君定为腊丁文。”他所说的“俄国诏国中博士考定”一事，他的另一跋语中说得较为详细。由于他赠于式枚的诗中提及这一件古物，使俄大臣杨儒（寿鸿）读到这首诗，“因书来索观腊丁槃墨本。乃以数拓寄之，属其就彼国方闻之士，博考书体。卒无所得，是可异也”。宋芸子即民国初年以清遗老出名的宋育仁，“腊丁”即“拉丁”的旧译名。前面已提到过的，伯希和认为铭文的字体，有点希腊文的气味。蔡季襄的文中，根据一位“H.m.教授”的考译，认为这一圈铭文的字母有几个是古希腊文，有几个是古拉丁文，乃是两国语并记式，西域古币上常有这种情形。这最后一种说法是错误的。古币上是有两种文字并记式，但是像我国清朝的铜钱有汉字也有满字一样，每一个字的组成总是一种文字，不会一个字的组合中有两种不同语文、不同字体的字母。细加观察，这铭文实是传写失真的希腊文。

(I)	(II)	(III)	(IV)	(V)
Β ΠΥΥ	Β ΙΥΥΩ	ΩΑΛΩ	ΠΩΙΛΙΩ	ΥΧΝΒΥΛΥΧΥΧ
Β ΙΑΙΥ	Β ΙΑΙΩ	ΩΑΛΩ	ΠΙΚΙΝΩ	ΤΧΙΥΗΛΛ?Χ
Βασιλεως	Βασιλεως	ΑΡΣΑΚΟΥ	ΕΠΙΦΑΝΟΥ	ΦΙΛΕΛΛΗΝΟΥ

图 5-2 铭文的复原（依据密兴黑尔芬的说法）

最近密兴黑尔芬根据这一个假定，对于郑文焯拓本上的铭文，加以研究。我们知道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西亚所使用的古钱上希腊字母，常常传写失真。因为当地的人民是使用另一些语言和文字的，只是统治阶级使用希腊文而已。写刻币范的工匠多半是不懂希腊语文的，所以容易传写失真。密氏将这铭文和西域古币上铭文相比较，以为它和晚期安息“德拉克麦”（Parthian drachms）货币上的铭文最为相似（“德拉克麦”是希腊的铸币的一种，后来希腊化的国家如安息等国，都加沿用）。货币上的铭文常采用缩写的办法，一个字中常省略掉几个字母。密兴黑尔芬根据安息古币上铭文的比较研究，以为可以将郑文焯拓本上的铭文，由传写致误的字母（见图5-2，第一行）先复原为晚期安息古币上所常用的虽已歪扭尚未完全失真的字母（见图5-2，第二行）；假定这复原的铭文是省略掉一些字母的，可以拿字体正齐、铭文完备的早期安息古币上铭文来做比较，复原成可以读得通的希腊字的铭文（见图5-2，第三行）。

安息货币上铭文的退化（字母的省略化和字体的歪曲化），据摩根的研究，在

公元后第1世纪后半便开始了,到第2世纪后半和第3世纪初更为增剧^①。如果不是由于有了一系列的时代相衔接的各币清楚地表示出变化过程,我们简直将毫无办法读出晚期安息货币上的希腊字铭文。附图中的铭文,Ε或Ϛ写作Ι,Ω作V或Ⅲ,Κ作Δ,Φ或Ν写作Χ,Ε写作V,在晚期安息钱币铭文上都可以找到例子。第(V)个字的词首添加一个没有意义的字母T或V,词尾将VX二字母复写一遍,也都有例子。只是将H写成V,在安息币铭文上未见此例,所以在附图中作一疑问符号^②。

密兴黑尔芬的这个复原工作,不能说已算是最后的解决。我们找不出一个安息钱,它的铭文的退化,恰和图5-2第二行相近,可作为这些铜饼的蓝本。我们也找不出一个铭文恰是这五个字。一般都字数较多。密兴黑尔芬以为可能图像下面的几个字没有打印好,所以没有被抄仿。解释得颇为勉强。但是这确是一个值得考虑的说法。假使他的复原是对的,那么这铭文的希腊字原文,应该是安息“德拉克麦”钱币上的铭文。据摩根的考释,我们知道其中第(I)、第(II)字,可译为“万王之王”,是该处国王的称号。第(III)字可拉丁化写作Arsaces,便是我国古书上译作“安息”的人名,乃是波斯的安息王朝建国者“安息一世”(约公元前250~242年)的名字。直到“安息三十一世”(216~226)为萨珊朝所灭为止,这王朝的每个国王都叫做“安息”。安息作为族姓,每王另有私名,但在钱币上很少标举私名。第(IV)字可译为“显赫的”,第(V)字可译为“爱好希腊[文明]的人”,都是一种尊号,是安息国王们所常采用的。晚期安息钱币的铭文常包括有这五个希腊字。不过在第(III)和第(IV)字之间,一般都增入1~2个字,晚期安息钱币除了希腊字铭文,还常兼有阿拉美亚字母的塞姆文(或名为原始型钵罗钵文),二者并列。这开始于公元后第1世纪后半,但还不常见;到了第2世纪后半至第3世纪初,才成为经常的现象。原来的希腊文的“王”字为钵罗婆文的王名和尊号所代替。如果我们这铜饼上的铭文是仿抄自安息钱币的,仿抄的人既不懂原文,假使他所碰到的是两种文字并列式的铭文,他似乎不会只专门仿抄一种的。作为蓝本的安息钱币,可能是公元第1世纪后半到第2世纪前半的,当时铭文已是退化,但还未采用两种文字并列式。

这批铜饼铭文,可以分作二种:第一种是郑文焯原藏的,也便是迈尔夫人现藏的一件。这种铭文在前面已细加分析,似包括希腊文五个字。第二种是霍明志原藏的那一件,铭文中多出一组字母。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4件,多伦多博物馆所藏的一件,蔡季襄所发表的一件,都是属于这一种。这一种铭文和第一种的不同点的是在前述第(IV)和第(V)字的中间,多出一个和第(II)相同的字,

① 摩根(J. de Morgan):《东方古泉学手册》第1卷,第145~148、164~171页,1923~1936,巴黎。

② 密兴黑尔芬,前引文,第3~5页。

仅缺少第2个字母而已。前面说过的，第(Ⅱ)字的译义为“王”。在安息钱的铭文上，从来没有在第(Ⅳ)和第(Ⅴ)的中间插入这一个字；并且这字插入这里是没有意义的。这似乎是由于这一种铜饼直径都在5.4厘米左右，较之郑文焯那件径仅4厘米的为较大。围绕一周的铭文也应该较长，所以只好添入一群字母。如果这样，这第二种的铭文不是直接由安息钱上铭文仿抄而来，而是仿抄第一种铭文，所以它是比第一种铭文为晚。仿抄铭文的不懂原文的意义，所以随便拿一组字母，并且随便插入。但是，如果不是偶合，最早的仿抄者似乎仍知道哪几个字母成为一组。他用第(Ⅱ)字(漏掉第2个字母)重复写出放在第(Ⅳ)字的后面〔郑的拓本铭文，在第(Ⅳ)字的末一字母和第(Ⅴ)字的头一字母之间，并没有比较其他字母之间留有更大的空隙〕。后来近代的伪造者，辗转仿造翻制，有些更走了样，如B写成E，X写成V或×。但是大致尚保留第二种铭文的原样。

其次，关于年代的问题。霍明志以为“锈色形式确系东汉之物，花纹与汉瓦当之龙，丝毫不爽”。蔡季襄一方面说“此币为当日拜占庭发行之通货，殆无疑义”，另一方面又说“汉武帝铸造马蹄麟趾金币，实际即模仿西域货币形制。今更有此币之发现，加以证实，则当日武帝之马蹄金饼，完全仿自罗马，益信而有征矣”。我们知道拜占庭(即君士坦丁堡)是公元后330年经过扩建后才成为罗马的重要都市。它成为罗马的重要铸币中心之一，也是第4世纪才开始的事。至于拜占庭帝国是指公元后395~1453年的东罗马帝国，时代更晚。“拜占庭发行之通货”，决不能为在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所铸造的金币所仿。蔡季襄推测它似为罗马安东尼(138~161)的货币。安东尼没有铸过这种货币。第2世纪的罗马币也不能作为汉武帝铸币所仿。罗伯昭定它为战国汉初金饼(见历史博物馆捐赠品上的标签)，大约是由于它的形状与长沙出土的汉代金饼相似。密兴黑尔芬以为它所仿抄的铭文的年代是公元2世纪后半以前，龙纹浮雕的风格是后汉至迟是三国时代。各家的意见虽不完全相同，但都以为是汉代物。如果前面所说的铭文的考释足以证明它仿抄公元1~2世纪的安息钱上的铭文，那么它的时代应是东汉晚年，也许稍晚。除非是近代嗜古之士或古董商的仿古，否则也不会晚得太多。

最后，谈谈它的用途和制造地点。郑文焯认为它是西方“彼邦古物”。据说沪上“一高丽儒者谓是俄罗斯国千年前奖武宝星”；又说：“顷见俄国旌武功勋章图，有类是一格者。它国多不勒文字，作回环书式。”郑文焯又记述他的同乡刘荔孙的话，说“此当是罗马古印信之文”。这些猜测的用途，似乎值不得认真加以考虑。不过他们都以为它是外国的古物，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郑文焯又称它为“金槃”，是“金属盘状器”的意思，实在便是“铜饼”的雅名而已。

霍明志将它定名为“金盖”，以为花纹是汉瓦当之龙，背面洋字。可以为汉代洋人来华的证据。但是这件东西并不像是一种器盖。

罗伯昭认为这是一种货币，定为“麟趾金”，说：“正面龙文，背面西域文字，

不可识。中方印二枚。”又称它为“战国汉初金饼”。如果是“麟趾金”，这是西汉中叶才创制的（汉武帝太始二年），又应该是黄金铸造的^①，既不会早到战国汉初，也不是像我们的标本用铜铸的。蔡季襄也认为是货币，是麟趾马蹄金币。但是他以为它铸造于汉西域大秦国，并且推测它“似为罗马奥理连至安东尼王朝之贬质货币”。按奥理连（161~180）为安东尼（138~161）的继子，所以也称为马克·奥理连·安东尼；不知道何以将二者前后倒置。这二王的货币中都没有这样的花纹和铭文。蔡季襄以为正面所饰的浮雕便是常见的汉代泥制马蹄金的“水波纹”，背面中央两枚方形烙印，便是中国古文羌字；又说：“此项……烙印，或即当时西域各国对中国之称，亦未可知。否则为记载重量之烙印。”这些印款，并不是“烙”印，没有灼烙的痕迹，实在是用印模撞打所成的戳记。在古今钱币上，尤其是金银币上，这种戳印是很常见的，有的是文字，有的是符号。这些铜饼，都有这样两个方形戳印，虽不很清楚，似乎是一种符号，决不是中国古文羌字，也不是西域各国对中国之称，更不是记载重量的烙印。密兴黑尔芬因为龙形的浮雕是中国风格，所以肯定它是中国匠人所铸，铭文是中国人所仿抄的失真的希腊文。但是他没有说出它是作什么用的，也没有说明中国人当时为什么仿抄这些外国字的铭文。

我个人的看法，这种铜饼（现代的贗品除外）似乎不是我国人铸造的。如果是汉魏时代的东西，我国当时没有仿抄外国铭文的先例，并且也想不出他们当时为着什么要这样仿抄。它的形状和汉代黄金圆饼（“马蹄金”）^②相似，这似乎由于同是金属质料而铸造方法也相近似所致。它的浮雕花纹和汉初泥质“马蹄金”的云纹（黄金制的都无花纹）不同。这花纹粗看有点像汉代瓦当上的龙纹或朱雀纹（不像水波纹），但是细加观察，便可以看得出并不相同。这些浮雕模糊不大清楚，和瓦当上写实的动物纹不同。但是我也不能确定它到底在西域哪一处铸造的。它们的出土地点，据说有河州、洛阳、长沙和寿州等处。但是这些地点都是古董商人所编造的，并不足信，所以并没有提供我们以探讨它的铸造地点的线索。

至于它的用途，也是一个未能解决的谜。前面说过的，有些人曾猜想它是“旌武功勋章”、“印信”或“器盖”，是出于乱猜，值不得加以考虑。比较可能的是作为一种货币。它的形状确有点像货币，尤其是像我国汉代的黄金制的“马蹄金”（以及仿之而制的泥质冥币）。但是，像我在前面所说的，这种相似只是表面的。汉代没有铸造过这种样式的铜币，并且当时也不会铸造完全是外国字铭文的

① 《汉书》卷六，页28，百衲本。

② 长沙出土黄金圆饼，解放后已有四件，见《长沙发掘报告》，第119页，图版七二（科学出版社，1957），《文物》1960年第5期，第35~36页。又衡阳出土一件，见《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6期，第53页。泥质金饼很多，参阅《长沙发掘报告》，第82、102页，图版五六。

货币。至于西域各国，包括安息在内，也都没有这种样式的铜币。传世的安息钱，都是正面为国王半身像，背面为神像。神像的上下左右有铭文组成的方形框子^①。它们和这种铜饼大不相同。如果说是厌胜钱，这铭文也没有厌胜或辟邪的意义。

将来考古发掘出来的地下物质史料，也许可以对于这个谜的解答提供线索。我写这篇短文，只是想引起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附记：承中国历史博物馆交给我这批材料，要我鉴定，并给我以研究的方便，书此志谢。

^① 摩根 (J. de Morgan):《东方古泉学手册》第1卷,第125~151页。

西安汉城故址出土一批带铭文的铅饼^{*}

1965年3月，西安市西北汉城故址内西查寨大队的地里发现了一批带外国字铭文的铅饼。3月26日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的同志前往调查时，队里将这批铅饼交给西安研究室的同志。带铭文的铅饼，共13枚，盛于一陶罐内。另有一件平素无纹的铅饼，作为盖罐子之用。这13枚都是一面凸起，有浮雕的龙(?)形纹；另一面凹下，周缘有一圈铭文。这种铭文，有人曾试作考释（见《考古》1961年第5期，第273页）。罐子是灰陶小口平底罐，肩部和腹部有被抹平的绳纹痕迹。底部被凿穿。出土时罐口向下。那件平素无纹的铅饼便盖在穿孔的罐底上。这批铅饼曾经撮要发表过（《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第81~82页，图九和图版五，2，罐子见第83页图一〇）。现将盖罐用的一件铅饼，编为1号，其余13枚，编为2号至14号。各枚的重量及其他有关情况见表5-1（《备注》栏中元素，系用X光萤光能谱仪测定）。

除1、8、10、12号4枚有残缺者外，其余10枚的平均重量为139.6克。测过比重的四枚，其平均比重为11.3。肉眼观察14枚的光泽都与铅相同。化学分析结果，可以肯定是铅饼。所包含的杂质，就锡元素的有无而言，平素无纹的1号，显然和其余13块不同，可见材料来源不同。形状也是分属于两个类型。后者根据铭文，当为外国传来的；而1号则可能为中国产的铅锭。

表 5-1

编 号	重 量(克)	比 重	备 注
1	260	—	边残,有锡,微量,无锌、银
2	140	11.4	—
3	142.4	—	微量镍,无锡、锌、银
4	132	11.2	无锡(其余未查)
5	138.2	—	—
6	138.5	—	无锡(其余未查)
7	140.5	11.2	—
8	119.6	—	边残,无锡(其余未查)

* 本文原载《考古》1977年第6期，署名“考古研究所资料室”。

续表 5-1

编 号	重 量(克)	比 重	备 注
9	138.5	—	—
10	126.9	—	凹面剥蚀较多
11	144	—	—
12	125	—	缺一块
13	140.9	11.3	—
14	141	—	—

另外,考古研究所资料室曾接到陕西省扶风县文化馆 1975 年 7 月 15 日来信,说该县揉谷公社姜嫄大队村东出土了两枚铅饼(《考古》1976 年第 4 期)。这二枚和这一批西安西查寨出土的铅饼与甘肃省灵台县出土铅饼(《考古》1977 年第 6 期,第 427 页)都几乎完全相同。

“和阗马钱”考^{*}

这一枚所谓“和阗马钱”系黄文弼先生于1929年在和阗北的阿克苏比尔的旧城所得。黄先生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对于这枚铜币曾加描述和考释如下：

圆径2.4厘米，厚4毫米，重14.8公分。无孔，亦无周廓。面镌一圆圈，圈内刻一马像作走势，圈外似有字迹，但甚模糊。背面中心刻一叶状形，外围似有一半圆形图案；中间刻字，字颇模糊，似有篆文“四铢”二字。“四”字倒写在右，“铢”字在左，颇类似孝建“四铢”钱。当然，此钱形制完全为西域式，无孔而厚，与内地有孔钱不同。但中杂汉字，是亦有趣问题。斯坦因在和阗亦觅得同样古钱，一面有汉文“四铢”二字，同在一边顺写；一面为马及佉卢文，与此钱大致近似而稍大。据斯坦因解说，时代约在公元后170~200年（Inner-most Asia，图版CXIX图4）。不过此钱“四”字倒写，与“铢”字左右分离，似与彼不同一型范，是否为同一时代钱币，尚须作进一步之研究。^①

原报告的照片和拓本，都不清楚。这枚铜币现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登记号为“考3247”，承该馆惠借以供研究。现重拓出较清晰的墨本，连同复原的摹本，制版如附图。

这枚铜币的花纹和铭文，不是镌刻的，也不是浇铸的，而是打压成的。这是中亚各国的古币承继希腊铸币传统的造币方法。马像的周围有佉卢文的铭文一圈，共20字。我们这一枚虽稍漫漶，但仍有一半左右大致可辨。现在参考其他书籍中的图片^②，复原如图5-3之3。图中实线的字是在拓本上仍可看出的，双钩的字是复原的。由复原图上箭头的柄端开始，顺着箭头向左读，其文如下：摩（Ma）诃（ha）罗（ra）阇（ja）娑（sa）、罗（ra）阇（ja）提（ti）罗（ra）阇（ja）娑

* 本文原载《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

①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110页，科学出版社，北京，1958；图版一〇五，图32。

② 斯坦因三部关于新疆考古的正式报告中，都有这种铜币的图片。摩根的《东方古泉学手册》（1936，巴黎）也有一摹本，但其中有三字摹错了，现据Serindia一书中图版CXL图1，加以改正。

(sa)、摩 (Ma) 诃 (ha) 埤 (ta) 娑 (sa)、
矩 (Gu) 伽 [罗] (gra) 摩 (ma) 耶 (ya)

娑 (sa)。佉卢文是一种字体的名称，它是用以表达“俗语”(Prakrit)。现在将这铭文译意如下：“大王、王中之王、伟大者、矩伽罗摩耶娑。”其中“伽罗”原来用一字表达，因为它是“复辅音”。据赫恩雷(R. Hoernle)的调查，这种铜币有三种不同的铭文。它们的差异点是末尾倒数第二第三字，除了“摩耶”之外，或作“摩陀”(mada)，或作“陀摩”，因之，他推论这末尾二字可能是名字，而矩伽罗是皇室的姓氏，与后来于阗国王姓“尉迟”一样^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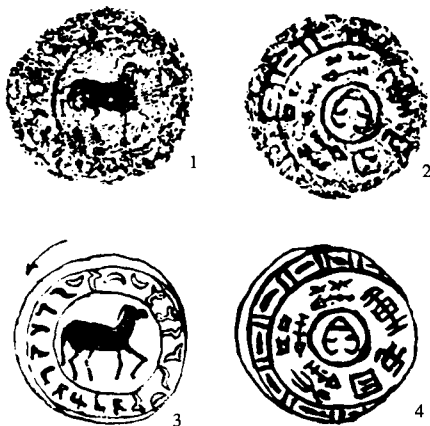


图 5-3 和阗阿克苏比尔
出土的“和阗马钱”

1~2: 原物的拓片; 3~4: 复原的摹本

另一面的铭文是汉字篆文一圈，计 6 字：“重廿四铢铜钱”（或以为应由“铜”字起读，但依照下文所提到的的小钱铭文“六铢钱”之例，似以“重”字起读较为恰当）。“四”字在“铢”之上，并不左右分离，观本文所附的新拓本自明。原报告似误读“钱”字为“铢”字。中央的花纹，或以为是“月桂树的环”，或以为是“贝”字。依中亚古钱惯例，马像一面为背面，这面当为正面。这枚铜币和斯坦因的一枚，铭文和花纹几乎完全相同。它们虽不必是用同一型范打压而成，但为同一段时期内所铸造和流通的钱币，当无疑问。

这一类型的铜币，有大、小二种。我们这一枚是大钱。另有小钱，重量约合大钱的 1/4，一面是汉文篆书“六铢钱”三字（有人误读为“五铢”，但所有可认辨出来的铭文，都是“六”字，无作“五”字者^②）。另一面中央为动物像（马或骆驼），周围有佉卢文或 20 字（骆驼纹小钱），或 13 字（马纹小钱）。王名中也有“矩伽罗摩陀”和“矩伽罗陀摩”。这种小钱当是和大钱属于同一时代的。这些铜币近数十年来在和阗地区出土很多。赫恩雷在 1901 年汇报英国人于 1893~1900 年间在和阗所盗劫去的这类铜币，便达 97 枚之多（大钱 10 枚，小钱 87 枚）；斯坦因三次（1900~1901，1906~1908，1913~1916）来新疆，盗劫去的竟达 187 枚之多（大钱 29 枚，小钱 158 枚），其中除 1 枚系在莎车购入，10 枚系在库车购入〔其中 3 枚传系附近的裕勒都斯拜格（Yulduz-bagh）出土〕，其余 176 枚也都是和阗地

① 榎一雄：《所谓シノ一カロシエティー钱について》，《东洋学报》第 42 卷第 3 号（1959），第 4~5 页转引赫恩雷的论文。

② 榎一雄，上引文，第 29~30 页。

区出土（其中1枚传系阿克斯比尔出土，和我们这一枚出土地相同）^①。如果将小钱也考虑进去，这类铜币虽大多数为马纹，但也有骆驼纹的，似乎不能概括称为“马钱”。它们的主要的共同特征是：一面为汉文，另一面为佉卢文。我以为可以叫它们为“汉佉二体钱”（Bilingual SinoKharosthi Coins）。这名称和国际上古泉学文献中所采用的也大致相符合^②。

现在再来讨论“汉佉二体钱”的年代问题和它的发现的重要性。关于年代问题，各说纷纭，现仍未能完满解决^③。最初福塞斯（D.Forsyth）于1876年便提出以为是公元前1世纪大夏最后一王赫拉摩耶斯（Hermaeus）所铸，在大月氏（贵霜国）灭大夏以前。许多人盲目随和他这一说。但这是由于误读“矩伽罗”为“赫拉”。赫拉摩耶斯另有铸币，为希腊、佉卢二体字，和这不同。矩伽罗摩耶等是于阗国王，不是大夏国王。可惜这些于阗国王的名字在文献上无征，只好由间接方法来推定年代。

赫恩雷于1899年提出公元70~200年之说。这些和阗汉佉二体钱上的骆驼和马像和公元前50至公元后80年间的旁遮普一带塞种所建立的王朝中毛埃斯（Maues）、阿瑟斯（Azes）、阿最利西斯（Azilises）等国王的铸币相似。他们铸币铭文多是希腊、佉卢二体字；佉卢铭文中王名之前也常有“大王”、“王中之王”、“伟大者”等称号。和阗钱当是模仿这些钱而铸的。根据汉字铭文，当时汉族势力在于阗国必占重要地位，应该是公元73年班超降于阗王之后。又因为在旁遮普一带佉卢文在公元200年以后便不大通行，所以他推定这些铜币的年代为公元70~200年。斯坦因赞同他的这一说，不过他因为和阗一带的考古发现证明该地佉卢文流行较久，一直到第3世纪后半，所以他认为这钱的年代的下限，可以比公元200年为稍晚^④。如果我们认为这种铜币应该和它所模仿的塞种国王铸币的时代相距不远，那么，赫恩雷的原说仍是采用的。

德微利亚（M.G.Devéria）因为和阗小钱有些有汉文“六铢”二字，认为当在陈宣帝太建十一年（579）铸“六铢”钱之后。但是这些小钱并不是模仿陈六铢钱而铸。陈钱流行不广，决不能远达和阗并使之受影响。他又误读另一小钱上的“六铢”为“五朱”，以为汉钱中以“朱”代“铢”，始见于刘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其次为南梁（502~556），因而推定为公元五六世纪时物。羽田亨也误认

① 榎一雄，前引文，第4~6页，又第10~12页。

② 一般称它们为“汉文佉卢文钱”（Sino-Kharosthi Coins），但拉克伯里（A.T. de Lacouperie）称之为“大夏文汉文二体钱”（une monnaie bactrochinoise bilingue）。“二体”一词加进去似更醒目，而省去二个“文”字则较为顺口。

③ 见前引榎一雄文，第33~34页，文献见该文附注。

④ 斯坦因：《古代和阗》，第204~205页。《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引斯坦因说，作170~200年（第110页），“170”当系“70”之误。